

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的患难之谊

——中哈友谊的历史见证

□ 王培洲

际，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伸出援助之手，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

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的偶遇发生在一次音乐会后。彼时，听众早已散去，拜卡达莫夫发现了衣衫单薄、忧郁深沉，独自一人坐在剧院大厅的冼星海。拜卡达莫夫不由发问：“剧院马上关门了，你怎么这么晚一个人坐着？你从哪里来呢？”虽然语言不通，但直觉告诉他这个黝黑瘦削但眼神坚毅，怀里紧紧抱着小提琴的年轻人急需帮助，于是他抓起冼星海的手，毅然把冼星海领到了自己家。拜卡达莫夫全家共8口人，挤在一室一厅的狭小空间里。陌生人的突然造访让拜卡达莫夫家中的母亲十分惊讶，拜卡达莫夫对母亲说道，“如果你的儿子无家可归，您肯定也希望谁能把他领回家。而且他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是一个音乐家”。“孩子，留下来吧，这就是你的家。”拜卡达莫夫的母亲对冼星海说。患难之中见真情，她把冼星海当成自己的儿子，将家里最大的床和最好的面包分给了他，为了帮助冼星海躲避当时的安全审查，拜卡达莫夫一家甚至改名换姓。

冼星海对音乐的执着不断打动着拜卡达莫夫，为了让冼星海有更好的创作条件，拜卡达莫夫把冼星海安置到自己的姐姐达娜什家。在这里，达娜什叫冼星海“阿弟”，食物紧缺但共同分享，还在房间里单独给冼星海隔出一角，使其能够得到更好的休息，以便安心进行创作。在达娜什孩子生病遇到困难时，冼星海二话不说去市场卖掉自己的手表和大衣，和达娜什一家共渡难关。艰难岁月并没有磨灭冼星海对音乐的热忱，冼星海怀着强烈的感激与热爱之情，像海绵一样汲取着哈萨克音乐生气勃勃的力量，在创作中将哈萨克曲调改编成小提琴曲、钢琴曲，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

音乐之交

音乐是冼星海与拜卡达莫夫等音乐家的共同语言。1943年，冼星海受阿拉木图作曲家协会委托，为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台创作了一部管弦乐组曲《满江红》。名字的由来是因为第一乐章采用了《满江红》的曲调，“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这一时期冼星海创作的优秀音乐作品还有第一交响乐《民族解放》、第二交响乐《神圣之战》、组曲《中国狂想曲》等，不少作品得到阿拉木图作曲家协会的书面肯定。

拜卡达莫夫非常欣赏冼星海的音乐才华。1944年1月，拜卡达莫夫推荐冼星海到距离阿拉木图1500多公里的科斯塔奈市音乐馆做音乐指导。在这期间，冼星海真正接触到了丰富的哈萨克传统音乐，广泛搜集并记录了大量哈萨克民歌民曲，成为他音乐创作的素材和源泉。1944年2月，冼星海完成了日后曾在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台播出过的《哈萨克女声三部合唱曲》。1944年10月，冼星海又把根据哈萨克斯坦民歌改编的《郭治尔—比戴》《哈萨克进行曲》《嘎什克—然尔》组成《哈萨克乐器独奏曲》。

值得一提的是，冼星海还与拜卡达莫夫一道，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

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诗《阿曼盖尔德》。冼星海充分利用钢琴、通过震音、颤音、滑音等不同弹奏技巧，以及丰富的力度变化、音乐手法来表现丰富的旋律和立体的情感。1944年正是这位哈萨克斯坦民族英雄牺牲25周年，交响诗首次在音乐馆公演时冼星海亲自担任小提琴手，在观众面前展现出哈萨克大地的美好风光，以及阿曼盖尔德和哈萨克斯坦人民的乐观主义精神，激励着哈萨克斯坦人民抗击法西斯。演出赢得了观众如雷般的掌声，也成为在哈萨克斯坦最广为流传的交响乐之一。当时的音乐馆馆长叶谢托夫在1958年出版的歌曲集封面中有这样一段话：献给伟大中国人民的儿子，走在革命前列的，过早逝世的著名作曲家、革命家、共产党员，我的真挚朋友冼星海。

友谊之桥

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辉，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用音乐在中哈两国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桥梁。正如拜卡达莫夫之女拜卡达莫娃教授所言，“仅从冼星海对哈萨克斯坦人民的真挚感情，热情挖掘哈萨克音乐文化，并留下大量哈萨克题材作品这一点上看，冼星海就应该在哈萨克斯坦得到应有的纪念”。今天，冼星海虽已去世70多年，但哈萨克斯坦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好朋友用音乐对哈萨克斯坦所作的精神鼓舞，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在最困难的战争年代哈萨克斯坦人民为他雪中送炭。两国人民用各种方式对冼星海作永恒的纪念。

1998年7月，阿拉木图冼星海故居揭牌，纪念牌上分别用哈语和俄语书写着：1943年，中国杰出的作曲家冼星海曾在这幢房子里居住过，牌的右上角用中文仿宋体刻着“冼星海”三个字。1999年11月冼星海大街命名暨冼星海纪念碑揭幕仪式在阿拉木图举行。整个纪念碑是一朵绽放的莲花，莲叶为基座，三个莲花瓣为碑体，花瓣之间用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期间创作的交响诗《阿曼盖尔德》中的头两段音符相连。高三米的主碑上镶嵌着一幅冼星海的半身浮雕像。在三个莲花瓣状的碑身正面分别用中、哈、俄三种语言刻着文字：谨以中国杰出作曲家、中哈友谊及文化交流使者冼星海的名字命名此街为冼星海大街，碑身背面也分别用这三种语言刻满碑文，纪念冼星海为中哈友谊作出的贡献。

如今，冼星海同拜卡达莫夫这段传世佳话被搬上大银幕。2019年5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合拍故事片《音乐家》在北京举行首映发布会暨首映典礼。电影再现了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之间的患难之交，不少观众看完电影已眼含热泪，《黄河大合唱》《阿曼盖尔德》的旋律不断在耳边奏响。今天，两国人民对两位音乐家的纪念越来越多、内容越来越丰富，让人们口口相传的不仅是两位音乐家的名字和故事，更是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深厚友谊。



黄土筑商城 萧萧车马鸣

——陕西清涧寨沟遗址考古发现

□ 孙战伟

陕晋两省交界处的南流黄河两岸是黄土高原的腹心之地，下切深厚的河谷、沟壑和支离破碎的梁、峁、塬、盖塑造了这一独特的地理单元。20世纪40年代以来，这一区域内的陕北、晋西陆续发现500余件商代青铜器，其中既有典型的殷墟风格的铜礼器，也有大量独具本地特色的兵器和工具，显示出独特、复杂的区域青铜文化面貌。80年代以来，随着清涧李家崖、辛庄、绥德薛家渠、柳林高红等商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学界逐渐认识到这一区域存在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李家崖文化。

2022年至今，为进一步深化黄土丘陵地区商代晚期的聚落与社会研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及榆林市县文博机构，以清涧寨沟遗址为中心开展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揭示出一处规模巨大、内涵丰富的商代区域中心聚落遗址。

内涵丰富的商代聚落

寨沟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清涧县解家沟镇寨沟村，地处南流黄河与其一级支流无定河之间，是一处以寨原盖大型夯土建筑群为核心，外围山岭密集分布大型墓地、小型墓地、铸铜遗址、平民生活区等不同功能遗存的商代大型聚落遗址，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其规模巨大、遗存丰富、要素齐全，凸显出商代北方黄土梁峁地带方国中心聚落遗址“多峁一体、功能互补”的分布特征。

遗址核心区位于一处两沟交汇处的独立塬峁——寨原盖上。塬顶四周为一圈夯土包边墙，现存墙体最高达16米，其内可见分布规律的红木洞。塬顶部自然山体经人工去高填低、镶边包坡、整体夯筑成开阔平坦的夯土台基，面积约2万平方米。台基中心建造有一组由中院落和四周廊房组成的“回”字形下沉式建筑群，建筑群合围区域面积约6000平方米。建筑群西侧发现一保存较好的斜坡门道，门道南北两壁各等距设置壁柱，地面还有倒塌木柱残存，底斜坡向外，铺设木板尤为罕见。建筑遗址内出土大量李家崖文化陶片及部分石器、骨器、卜骨等遗物，西门道填土内还发现有集中填埋的破碎石磨、石斧、石钺、石铲等残片，部分可基本拼对完整。在核心区半径1公里范围内共发现了5处规模更小的夯土建筑遗存，说明寨沟先民可以熟练使用夯筑技术建造规模不等的各类建筑。

铸铜遗址位于寨原盖以东约500米的鱼塔梁地点。在该处一段

夯土护坡墙基槽中发掘出土40余块陶范残块，可辨纹饰有云雷纹、联珠纹、兽面纹等，器类有簋、觚、觶等铜礼器以及车舆饰件。陶范纹饰繁缛、精细，殷墟风格浓郁，显示出当地已具备成熟的铸造技术和能力，是探讨当地青铜器来源问题的关键材料。

小型墓地分布于距离寨原盖2公里的范围以内，已发现7处。其中鱼塔梁墓地经过发掘，发现商代小型墓葬34座，均为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口面积多在3平方米以下；墓向以东向西为主，占比约70%；葬具均为木质单棺、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头向西向较多（60%）。随葬陶器仅有一件陶鬲或陶钵，青铜器是铜戈、削刀、斧、蛇首匕等工具或者兵器等，还出土有珍贵的红玛瑙珠、海贝、螺壳组合项饰。完整的陶、铜器组合墓葬，为研究器物功用、组合、年代和丧葬习俗等问题提供了最新材料。

大型墓地分布于距离寨原盖2公里以外，包括后刘家塔墓地、瓦窑沟墓地在内共有11座甲字形大墓，是殷墟以外发现规模最大的商代墓葬，多数墓葬土方量已经超过安阳西北冈商王陵的大墓。2022年对后刘家塔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共有4座墓葬，墓葬虽均遭到不同时期的严重盗扰，仍出土铜、金、玉、陶、石、骨、贝等随葬品200余件。较为重要的有M1出土铜车马器，包括铜铃、铜衔首、铜觶、镶绿松石铜八角形銜饰、衡末饰等，另有一件燕形镶绿松石铜带扣，十分精美；M2出土一件夔龙纹骨器残片；M3出土有环首刀及镶绿松石兽面纹雕花骨匕，长45厘米，纹饰精美，形体硕大；M4出土三件金耳环，体现出北方文化因素的影响。大中型墓葬盛行车马埋葬，其中M3编号12的随葬车形制最为奇特，其平行的双直辕前端横置一弓形饰，后连接椭圆形车舆，单轴贯穿两轮，辕通长4米，轮距约1.8米，车体木构末端多见青铜器饰件，轅、轳等部位髹漆，制作精美，装饰讲究。据形制结构特征观察，为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双辕车实物，将中国的双辕车历史提前了约1000年。

商代西土的强盛方国

甲骨文、金文和传世文献记载商代晚期的王朝周边方国林立，其中西北方向的方国有近70个，较为

著名的有土方、工方、鬼方等，这些方国与商王朝存在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寨沟所在的清涧县，上世纪80年代曾在李家崖遗址出土过“鬼”字陶文，李家崖文化的时代、分布地域也与商周时期鬼方的分布区域一致，因此吕智荣、张天恩等许多考古学者认为晋陕交界处的李家崖文化就是文献记载中的鬼方。

《周易·既济》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古本竹书纪年》：“商王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说明商代晚期，鬼方是王朝西土的一支强大的政治势力。甚至到西周时期的小孟鼎铭文还记载有周王命孟征伐鬼方的记载。商代甲骨文中则有鬼方为商王打仗、祭祀、捕获羌人、贡纳人性与官吏的记录，商王也多次责问鬼方有无灾祸，关心鬼方的安危，反映了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密切的友好往来。

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流通道

寨沟遗址所在的黄土高原是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农牧交错带，也是沟通中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的交流通道。寨沟遗址出土的金耳环、青铜工具和兵器以及日用陶器则具有鲜明的本地特色，葬俗也与殷墟迥异，但是车马器、玉器、骨制品、漆器等大量精美的高层贵族用品与中原殷墟文化几乎完全一致，个别器物甚至可与殷墟王陵出土的同类器相媲美。可见，寨沟先民在高级用器的制作工艺、器物造型、装饰艺术、器用制度上深受中原影响，反映了黄土丘陵地区与商王朝之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强烈影响。而在马、车等传播过程中，寨沟遗址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角色。

寨沟遗址的考古发现，揭示了迄今为止黄土丘陵地区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李家崖文化中心聚落的样貌，体量巨大的夯土建筑、成熟精细的陶范遗存、前所未见的商代大墓、精美的出土文物，在我国北方地区为目前仅见，揭示出商代晚期陕晋高原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独特性，对探讨商代方国政治地理结构、了解殷墟时期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作者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寨沟遗址项目负责人）



（上接1版）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与广东、香港、澳门分别签署合作协议，完善粤桂合作特别试验区、“两湾”产业融合发展先行试验区、广西东融先行示范区等合作机制，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在桂投资项目到位资金3730亿元，共建产业园区117个。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立健全港口扩能优服、通道高效畅通、物流提质增效、产业融合发展等政策体系和制度机制，大力发展向海经济、海洋经济、临港产业，北部湾港跃升全国沿海十大港口行列。推进平陆运河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综合改革，建立“三大工程”检查专家组和监督指导组工作机制，推动运河如期进入全线建设高峰期，截至今年6月底，累计完成投资350.5亿元，占总投资的48.2%。

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坚实基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广西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优质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乡村全面振兴任重道远。习近平总书记叮嘱我们，“乡村振兴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基础性工作，要落实规划、扎实推进”。我们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从自身实际出发，从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事入手，紧紧围绕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完善和创新农村体制机制，如期打赢脱贫攻坚

坚战，接续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立健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机制，探索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新模式，持续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住房等民生领域改革上发力，2023年广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7万元，是2013年的2.4倍。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持续推进“三变”改革，农村土地资源进一步盘活。完善现代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大力发展现代设施农业，横县茉莉花茶、柳州螺蛳粉、百色芒果、广西六堡茶等12个地理标志品牌入围2024中国区域品牌百强榜。完善糖料蔗购销市场机制，稳步推动糖业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战略性新兴产业，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连续33个榨季位居全国第一。

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提供制度保障。广西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同时是革命老区、边境地区，民族团结、边疆巩固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全区各项工作的主线，深入开展铸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行动，完善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制度机制，有形有感有效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

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持续巩固发展。建立健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常态化机制，健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机制，“广西三月三”“刘三姐”等特色文化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建立健全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优化提升机制，完善平安广西、法治广西建设机制，2023年全区群众安全感达98.54%。完善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机制，深入实施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持续推进边境地区“国旗工程”，坚决守住守好祖国的“南大门”。

为我国南方生态筑牢安全屏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广西是全国岩溶（喀斯特）分布面积最广和石漠化严重的地区之一，环境承载力十分有限，承担着维系珠江下游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安全的重大职责。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生态优势金不换”的谆谆教诲和“在推动绿色发展上迈出新步伐”的殷切嘱托，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切实保护好广西的山山水水，持续擦亮“山清水秀生态美”的金字招牌，生态质量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二，生物多样性丰富度稳居全国第三。统筹推

进山水林田湖草湿地系统治理，在全国率先实施生态保护清单制，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湾长制、林长制、田长制，探索推进“国家储备林林票”制度改革试点，漓江“统一管理、统一经营、统筹各方利益”综合治理模式取得明显成效，粤桂两省区九洲江流域环境联合治理模式成为全国典范，那考河海绵城市建设项目获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新型能源体系，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推进“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支持旅游、康养、文化和现代特色农业等生态经济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全面绿色转型。

把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抓实抓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深改委会议、企业和专家座谈会，多次深入地方考察调研，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行研究部署，释放了改革重要信号。广西一定坚决贯彻落实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

定改革信心，凝聚改革共识，锚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1+1+4+3+N”目标任务体系，接续奋斗、勇毅前行，真抓实干、善作善成，以钉钉子精神不断把改革推向深入，以中国式现代化广西实践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证。我们一定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定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八桂大地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加强各级党委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统筹领导，充分发挥改革专项小组和责任部门作用，做好政策统筹、方案统筹、力量统筹、进度统筹工作，强化集中统一的改革领导体制、务实高效的改革决策机制，牢牢把握改革领导权和主动权。完善领导领衔推进重大改革制度，鼓励和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发挥好示范引领和模范带动作用，看准了就坚定不移抓，把该改的、能改的改好、改到位，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更大突破。

改革有破有立，得其法则事半功倍，不得法则事倍功半甚至产生负作用。我们将自觉锤炼过硬专业本领，深刻把握规律、改进方式方法，不断

提高抓改革的能力水平。坚持政策为大谋划推进改革，吃透吃准中央精神，围绕国家赋予广西的“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建设使命，找准切入点和发力点，推出一批紧扣中央部署、切合广西实际的改革举措，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坚持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持续推进一批重大改革集成，打好改革组合拳，强化改革举措优化整合和衔接配套，推动各领域各方面改革举措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增强整体效能。坚持重大改革试点先行、示范引领，注重激发基层的改革创新活力，善于发现和总结基层的实践创造，积极为改革发展探新路、作贡献。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我们将坚持不懈重实效、强实干、抓落实，形成全过程、高效率、可核实的改革落实机制。健全上下联动的统筹协调机制，完善专项改革方案对接落实、改革任务项目化推进、联动协同攻坚等制度，压紧压实改革主体责任，不折不扣抓落实、雷厉风行抓落实、求真务实抓落实、敢作善为抓落实。健全改革激励和约束机制，改进督办督察工作，完善改革绩效考评制度，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保护和激励支持改革创新。开展改革先进表彰，宣传改革典型，充分调动和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营造全社会关心改革、支持改革、推动改革的浓厚氛围。